

鲸舟吼浪泛沧溟 远涉洪涛渺无极

——郑和下西洋与舟山群岛

□罗沛文

620年前，郑和率领船队浩浩荡荡驶出长江口，开启了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征程。这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承载东方古国的文明与友谊，远涉重洋，抵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舟山群岛作为东海上的璀璨明珠，在这场航海壮举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星罗棋布的岛屿、纵横交错的水道，成为郑和船队重要的航海坐标和避风良港。同时，其深涉海洋的子民，为远航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使之成为连接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重要枢纽。

如今，我们通过梳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重新考据郑和船队与舟山群岛的深厚渊源，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从这段辉煌的航海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朝贡体系与海禁政策并施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政策，通过优厚的赏赐和官职册封，吸引海外各国前来朝贡。成祖朱棣即位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将朝贡贸易推向新的高峰。

同时期，明廷对盘踞在舟山群岛一带的方国珍残余势力深感忧虑。这些势力与沿海居民私自开展对外贸易，甚至勾结倭寇，严重干扰了朝贡体系的正常运行。据明代《舟山志》记载，舟山群岛被视为“宁郡之咽喉，定邑之门户”，其海防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浙东地区的安定。洪武十九年（1386），征南将军汤和经过深入考察东南海防后，明确指出舟山群岛“易居海岛、易生寇盗”，建议内迁居民，收缩海防线。

明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强制迁徙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仅留存五百余户人家。同时撤销了昌国县建制，将舟山群岛划归宁波镇海（彼时为定海县）管理。这一系列措施虽然加强了海防控制，但也对舟山群岛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明廷通过“朝贡”与“海禁”，构建出了官方垄断性对外关系模式，牢固掌握海上话语权。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受命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舟山人才与技术的大力支撑

郑和船队规模浩大，每次出使人数都超过两万人。使团人员结构完善，除了官吏以外，还囊括了技术人员、后勤保障和军事护卫等。根据明代卫所的《武职选簿》记载，随行官员中有十余名浙江籍人员，其中三人来自“浙江都司”（全称为浙江都指挥使司，为当时省级军事管理机构）定海卫”和“定海县”。由于洪武年间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与卫所制度，这里的“定海”指的不

是舟山群岛，而是以如今宁波镇海为中心，涵盖舟山群岛和宁波北仑等一干地区。因此由于史料有限，暂时无法确认这些人员是否是舟山人。但从多个方面可以推断，舟山籍人士在郑和航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根据明代文献《北轩集》记载，当时浙江全境都在大力支持下西洋事业，舟山作为沿海重地，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其次，明代官员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提到，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精惯下海”的船民，他们精通航海技术，能辨识海图、观察气象、把握潮流，因此被聘为船队的“火长”（即领航员或引水员）。当船队途经舟山海域时，极可能依靠这些本地船工引航避险、停靠补给。其三，舟山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就已有舟山与海外往来的记载。《三国志》中提到“宣洲”（可能是日本）的人从会稽郡（彼时该行政区划包括舟山群岛）获得货币，而“会稽东县”也有人借助大风和洋流航行至宣洲。沈清的传说也从侧面印证了两晋时期舟山人在中日韩航线上活跃。元代以来，舟山与台州、温州等地同为“泽国之民”，居民多以舟楫为生，熟悉海外贸易。元代诗歌描写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盛况：“青盖夜出民不知”，甚至出现了“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番语”的现象。这为郑和远航储备了大量具备外语能力和外贸经验的人才。其四，宝船的建造与维修需要大量技术工匠。永乐年间，朝廷多次下令浙江都指挥使司及下属卫所建造、改造海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从永乐元年（1403）到十七年（1419），明廷分派给浙江都指挥使司及下辖卫所的造船任务有数百艘，浙江的修造总量位居各省之首，这里应该有舟山籍船。

舟山在远洋航线中所处的关键位置

翻阅典籍可以推测出，郑和船队七次远

航势必途经舟山群岛及附近海域。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后，采用“海道针经”里“双针罗经”标识的“乙辰针（112.5度）”航行，见到余山在东北边过，然后用“巽巳针（142.5度）”航行四更（明代一昼夜被划分为“十更”），见到大小七山，最后用“坤申（232.5度）及丁未针（202.5度）”航行三更，到达滩山（今嵊泗县滩浒山）。其后，郑和船队需要经过位于如今普陀六横区域的双屿门航道，该航道是出入宁波一舟山区域的咽喉要道，后来大名鼎鼎的“双屿港”也正是位于该航道之上。《郑和航海图》详细记录了船队进出双屿港的航行路线和时间：“用乙辰针（112.5度），一更船，取小磨山，转崎头升罗屿，用丁未针（202.5度），一更船，出双屿港。”

郑和船队在返航途中依旧要经过舟山群岛。明代文人祝允明的《前闻记》就有记载，宣德八年（1433）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时，船队于“六月十四日至骑头洋（今峙头洋），六月二十日过大小赤（今嵊泗县大戢山、小戢山）”。此外，民间还流传着船队士兵因病滞留舟山岛屿，后来获救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舟山与郑和航海之间的深厚渊源。除此之外，《郑和航海图》《前闻记》等文献还标注及记载了不少航线沿路的舟山岛屿和航道，例如东霍山（今东极东福山）、西后门（今西岬门水道）等等。

舟山在物资与文化外传中的贡献

王安石曾颇具战略眼光地指出过舟山群岛“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闽瓯，西通吴会”。自元代开始，舟山群岛在远洋运输及进出口贸易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元代大德年间的《昌国州图志》就记载位于舟山的“岑江港（今岑港）”：“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船，辐辏于此，亦海州之一镇云”，

可见彼时舟山港口的繁忙。

唐代至明代初年，自内陆而来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特色产品很大一部分通过舟山这个东南沿海物资重要集散地销往海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在东非肯尼亚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明代龙泉青瓷碎片，其年代与郑和下西洋时期高度吻合。这些瓷器很可能在明朝经由舟山港口转运上船，延续了宋元以来浙江瓷器外销的传统。

事实上，浙江瓷器外运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在元代“南海一号”沉船中就已经发现了龙泉窑系瓷器，而在舟山也发掘出土过五代十国至明代的浙江瓷器，例如舟山博物馆展出的五代越窑青釉荷花纹瓷盖罐（马香茂盛采集）、五代越窑瓷粉罐（马香唐家墩出土）、五代以及宋代越窑青釉莲瓣纹瓷罐（定海城关北门口出土、马香采集）、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碗（茅岭采集）、宋代越窑青釉高圈足瓷碗、宋代龙泉窑青釉花口瓷碗（舟山海域出水）、宋代越窑青釉团花纹瓷粉盒（金塘浙港出土）、元代龙泉窑青釉双龙纹瓷洗（岑港涨次采集）以及明代龙泉窑青釉高足瓷杯等藏品。

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廷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仅没有抓住机遇，反而逐渐趋向保守，施行更为严格的海禁政策，渐渐退出了世界航海舞台。然而，舟山的战略地位从未被忽视。

回顾历史，开放与航海始终是舟山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舟山海洋经济取得显著成就。舟山不仅是郑和航海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者。从古至今，开放合作带来繁荣，封闭自守导致落后，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舟山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拥抱海洋，才能在新时期的海洋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以“信”为志，笔耕一生

从定海走出的翻译大家王永年

□胡子沛

王永年，出生于1927年，浙江定海人。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曾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外文编辑。他精通英文、德文、俄文、西班牙语、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是欧·亨利小说在国内的权威译者，也是中国从意大利原文直接翻译薄伽丘《十日谈》的第一人。他对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被认为是博尔赫斯汉译中最精确、最传神的版本。这位以翻译为志业，笔耕不辍、精益求精的译者，一生颇有实绩，却始终低调淡泊。循着王永年先生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的处处履痕，钩沉其生平与译事，品读其在俗与雅、轻松幽默与幽深玄奥、市井与哲思之间切换自如的译笔，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位从定海走出的翻译大家的理想与追求。

一、译路筑基：从圣约翰课堂到新华社译审

王永年父母皆为舟山人。王父毕业于南洋工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曾任云南盐务局局长，藏书颇丰，英文造诣深厚。王永年受这样的家庭环境陶冶，自幼便广涉中外经典，16岁考入被誉为“东方哈佛”、全英文授课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在这所培育了作家林语堂、外交家顾维钧、出版家邹韬奋等一批又一批中国现代各领域领军人才的学府中，王永年潜心学习，积累涵养，为他日后掌握英语之外的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回忆圣约翰时光、追溯自己日后翻译欧·亨利小说的远因前缘时，曾提到：“我首次接触欧·亨利作品的时间在大学一年级，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课程设置全部用英语授课。英语1、2是各院系的必修课，英语1的课本采用一部短篇小说选和一部独幕戏剧选，作为精读材料，旨在提高同学听读英语的理解能力。英语1的课本里有欧·亨利的一个短篇《钟摆》。作者巧妙的手法、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描写、貌似调侃而实质深沉的格调，当时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开始注意他的其他作品。”数年后，当初在圣约翰课堂上读《钟摆》原文的少年，化名“王仲年”（王永年有王仲年、雷怡、杨绮等笔名），竟成了《钟摆》的中文译者，人生的际遇，果然奥妙无穷。

王永年提到的另一桩圣约翰往事，则是他与张爱玲的同窗之缘。在他的记忆中，彼时班里有个月长相清秀，头发长长，脚穿南方地区流

行的虎头鞋的女孩子，其人便是二十出头的张爱玲，记忆中的那场景，真可谓同学少年，春风桃李。

194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王永年曾当过中学俄语教师、外文编辑，自1959年起担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他所译的新闻稿，以精练、准确著名。当新闻记者和编审的经验，对于王永年的译介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特殊的职业经验锤炼了他的笔致，使其求实、简省、精准，而这恰恰构成王氏译本最突出的风格，即翻译三标准“信达雅”之“信”，力求忠实于原文，忠实于作者的原意。

二、译介实践：俗雅之间，切换自如

王永年的译介实践中，用力最深、同时成就最高的当属他对欧·亨利小说和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1999年，中国第一套博尔赫斯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永年担纲主译。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独立翻译的《欧·亨利小说全集》，收录了欧·亨利所有的小说，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目前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有意思的是，欧·亨利小说和博尔赫斯作品不仅语言不同，一为英语，一为西语，其风格气质更是迥异，王先生一支译笔，却可切换自如，随原文气质而变，从容流利。

欧·亨利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其文本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欧·亨利式结尾”、突出的美式风格以及频现的俚语、双关语和典故著称，读来让人笑中带泪，泪中含笑，是典型的“市井小说”。如《麦琪的礼物》中的“麦琪”并非人名，其在西方原典中是“智慧的人”的象征；《供应家具的房间》中，“葡萄藤”和“无花果树”引自《圣经》，代表着“安定的家庭生活”；《警察和赞美诗》里则借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玻瑞阿斯”，来形容严寒的凛冽之气；《回合之间》中将容易受骗的人称为“龙虾”，属于地道的美国俚语。对此，王永年深有体会心得，他曾在《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序言中提到：“作家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讹言、谐音和旧典新意。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大量移民组成，欧·亨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词汇，并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典故。”王先生博览群书，经年积淀，对于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圣经》等西方原典中的典故，皆熟稔于心，能娓娓道来，又通晓多门

外语，因此才能最忠实地还原欧·亨利小说的独特风味。

而博尔赫斯的作品则完全呈现出另一派气质——抽象、玄妙，充满哲理思考。王永年认为，“博尔赫斯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时间和空间当作作品里的主角，在博尔赫斯的笔下，生活是个扑朔迷离、虚实相间的迷宫。”传统小说多以人物为主角，博尔赫斯虽也写人物，却并不着意于具体的人与事，而以时间和空间（尤其是时间）作为主角。如《环形废墟》写主人公在梦中造人，却偶然得知自己亦不过是别人的梦中幻影，小说没有提及时间，但无处不是关于“循环时间”的探讨；《阿莱夫》虽以爱情故事为前景，主角却是小圆球“阿莱夫”，它包罗万象，是无限时空的汇聚。因此，如何再现博尔赫斯文本中那精巧奇异的结构、简省优雅的语言、迷幻般的叙事氛围，尤其是他关于无限、循环、偶然的时间不倦思考，便成为一种极大挑战。作为《博尔赫斯全集》的主要译者，王永年的译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挑战，备受好评，陈众议先生、林一安先生等便认为，“在博尔赫斯的小说汉译中，王永年的翻译是最讲究、也是最准确的。”而他们之所以如此评价，背后还关联着一桩译坛往事。

三、推敲与求“信”：从《交叉小径的花园》到《小径分岔的花园》

西语作家博尔赫斯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内地，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发表于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里，王央乐选译了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南方》等四篇代表性小说。两年后，《世界文学》第6期推出了由王永年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王央乐和王永年两位先生遂成为业界公认最早将博尔赫斯作品引介到中国的译者，对于博氏作品的汉译有着开山之功。

细心的读者比较两位译者对于博尔赫斯小说的翻译，便会发现其间有趣的差异。不同于王央乐笔下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王永年将这个神秘优美的小说名翻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两字之差，却展现出对于博尔赫斯哲学的不同理解。在汉语中，“叉”与“岔”两字读音近似，内涵则大不同。叉，谓“手指相交错”状；岔，原指山脉分岔的地方，亦指道路、河流分岔的地方。交叉小径的花园，让人眼前浮现出一座静态的、小径交错的美丽花园；小径分岔的花园，则令人想象出像树枝一样分岔又分岔、无

限扩展的景观，因而独有一种动态感。正如有论者所言：“‘交叉’归于有限的结点，而‘分岔’则指向无限的向度。”

回到博尔赫斯的原文当中去看，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时间、可能性和选择的故事。主人公余准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德国，为德国人做间谍，他在得知英方的重大军事秘密后，想方设法要把信息传递回德方。余准将目标对准一个叫做艾伯特的汉学家，只因英军炮兵驻扎地的城市名也叫“艾伯特”，如果刺杀艾伯特一事能上新闻，这个军事秘密就能被德方捕获。在见到艾伯特后，余准却意外得知，这位汉学家的毕生研究对象正是自己的曾祖彭蒙。彭蒙一生执迷的两件事——写一本无限之书和造一座迷宫，这些想法在研究他的艾伯特这里都得到了理解和回应。艾伯特或许是世界上最懂彭蒙的人，是自己的曾祖在遥远异乡的知音。因此，余准和艾伯特一见投缘，相谈甚欢。然而为了完成自己的间谍任务，余准最终还是选择刺杀艾伯特。艾伯特被害前，曾告诉余准：“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故事最后，余准悲哀地发现，他和艾伯特之间的关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但面对分岔，他选择了其中一种，而杀死了其他无限种可能。以小径分岔又分岔、无限延伸扩展的花园迷宫来表征无限的时间和可能性，这就是博尔赫斯想表达的时空哲学。

可见，王永年从汉语当中撷取“分岔”二字，是精当传神地还原了博尔赫斯非线性、多维、无限的时间观。今天，当人们谈到这篇令博尔赫斯享誉世界的小说时，更多的是用到王永年翻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名字，而它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名，更是王先生对翻译之“信”这一准则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永年曾经特别低调谦逊地表示，他从事翻译工作不过是为了“糊口”。然而，只要我们仔细爬梳王先生的译介实绩，回望其数十年如一日的伏案耕耘，便会发现，他对于翻译之“信”的恪守，以及那种“一点一点啃”的执着专注，其背后的动力远不止是以翻译为“谋生职业”的现实考量，而更是一种视之为“人生志业”的抱负。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